

文化中国行 博物馆里的抗战记忆

一块浸染岁月的金矿石，一把锈迹斑斑的匕首，一份记录历史的资料……在齐鲁大地的抗战历史中，每一件文物都是“沉默的证人”。它们用最质朴的形态，诉说着山东军民在国难当头时的抉择与行动。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大众日报·大众新闻推出“博物馆里的抗战记忆”特别报道，派出多路记者，分别走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博物馆、沂蒙红嫂纪念馆、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地雷战纪念馆、胶济铁路博物馆、青岛市博物馆、淄博市博物馆，每个博物馆（纪念馆）选择一件代表性文物，通过一件件“沉默的证人”，打开一段尘封的抗战历史、热血故事。

一馆一文物

讲述山东抗战故事

□ 本报记者 王思晴 本报通讯员 尹君 郭明辰

沂蒙红嫂纪念馆

沂蒙母亲 冒死守护一份特刊

在沂蒙红嫂纪念馆，跨过“沂蒙母亲”王换于展室的门楣，透过昏黄的灯光，记者看到战时托儿所雕像中，王换于抱着一个尚在襁褓的婴儿，与其他孩子互动。继续了解王换于，就能发现这位“沂蒙母亲”机智勇敢的另一面。

除了创办战时托儿所，王换于还将一本《山东省联合大会特刊》保存了38年之久。“沂南县党性教育基地副主任刘瑞艳，指着展柜里的《山东省联合大会特刊》（复制品）说。1940年7月26日，山东各界代表300余人，突破日寇的层层封锁，来到沂南县青驼寺，秘密召开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选举产生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联合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山东省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的诞生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在抗战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会后，出版了一本《山东省联合大会特刊》。

“这本书共有20多万字，由于当时纸张以及印刷材料匮乏，这本书印数极其有限，是一份抗战时期少有的资料。书中收集了所有在会上作报告的领导人的讲话稿，登载了山东省的行政机构和群众团体所有领导成员名单，是极为重要的抗战历史文献。”刘瑞艳说。

会议过后，战争仍在继续，形势紧急。1941年，在日、伪军5万余人对沂蒙山区发起“扫荡”的紧急关头，时任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副参议长的马保三权衡再三，将《山东省联合大会特刊》交给王换于，并嘱咐王换于：“您一定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去保护它，等抗战胜利了，我们就来取。”虽然不知道书中的内容，但是王换于能够想到这本书的重要性，她把这本书用一块印花棉布包好，收藏起来。

为给这本书找个安全之地，王换于不得不将它频繁转移，有时藏在山洞中，有时埋在小树林里，更多的时候是随身携带，睡觉也不离身。

“最惊险的一次盘查与搜索发生在1947年。”王换于的孙女于爱梅讲起奶奶说过的往事。有一天，国民党还乡团闯进王换于家中，恶狠狠地问她有没有藏共产党的东西。“过去打鬼子的，到俺家也不过是喝口水，俺没见过什么东西。”当时，王换于沉着冷静地回答，但其这本书正塞在她的棉裤腰里，匪徒把刺刀架到她的脖子上威胁说：“今天要是交不出东西，就要你这条老命！”王换于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你们愿意要我这条老命，就拿去吧！”

在王换于家中一通翻找之后，没有收获的匪徒又要搜身。就在这时，王换于急中生智大喊大叫，故意解开衣襟让他们搜身，接着她又做出解裤带的样子，这些匪徒看见她的架势，断定她身上不可能有什么重要东西，就走了。就这样，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把书保存了下来。

王换于常常拿出这本书来晒晒，怕被虫子咬了。直到1978年，王换于已经成为年逾九旬的老人了，她担心自己的身体不能妥善地保存书籍，便把这本书交给沂南县。随后，这本书被征调到山东省档案馆，填补了省档案馆关于山东省联合大会的资料空白。



扫码阅读 更多报道



党员干部在威海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参观学习。

□记者 陶相银 报道

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博物馆

一块金矿石见证的“黄金运输线”

□ 本报记者 刘涛 本报通讯员 李明泽

泰安无金，却藏金魂。5月16日，当记者踏入泰安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博物馆时，一块灰褐斑驳的金矿石静卧展柜中央。它旁边，两根竹筒裂痕如泪，一条子弹袋磨痕斑驳，三件看似寻常的物件，却是八十多年前那场惊心动魄的“黄金大转移”的沉默物证。

泰安为何陈列金矿石？“这块石头，是我们从招远‘请’来的。”馆长丁兆村介绍。1939年的胶东，日军铁蹄踏下的招远金矿，每一粒沙金都浸着同胞的鲜血。而我党地下工作者却以血肉为盾，将淘制的沙金，封入竹筒，将一批批“特殊弹药”化作刺向敌后的利刃，沿着敌占区封锁线，秘密送往延安。

这条“黄金运输线”的守护者，就有从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走出来的战士孟英。

1913年出生的孟英，还在北平辅仁大学的课堂里接触马克思主义时，未曾想到，自己的人生竟与黄金产生宿命般的联结。1936年7月，23岁的孟英在党旗宣誓，从此将青春热



泰安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博物馆内陈列的金矿石。

血融入民族解放的洪流。

七七事变的炮火撕裂了华北的宁静。孟英奉命南下徂徕山，在苍翠山峦间参与那场改变山东抗战格局的武装起义。起义队伍分作两个中队：一中队汇聚着平津流亡学生与泰安县委的革命火种，二中队则由山阳庄的庄稼汉组成。孟英在中队旗帜前接过钢枪，在武装起义爆发后，又转战山纵一旅二团政治部，在战火中淬炼成钢。

台儿庄大战纪念馆

她的故事，写下最柔软却最坚韧的一笔

□ 本报记者 李子锐 本报通讯员 孔令欣

5月16日，枣庄市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内，一把匕首静卧于展柜中，刀刃已锈迹斑斑，鲜红的塑料手柄仍泛着微光。它的主人，是稚气未脱的少女——刘守玖。这把匕首，承载着一位18岁女兵的血泪、一个家庭的遗憾，更见证了中华儿女以青春赴国难的壮烈史诗。

1935年，湖南汉寿县军刘村的富商之女刘守玖考入长沙女子中学。这所名校曾培育出杨开慧、丁玲等革命志士，校园里涌动着抗日救国思潮。临行前，父亲将一把匕首交到她手中，用以防身。

谁承想，这竟是父女最后的诀别。1937年淞沪战役爆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17岁的刘守玖偷偷离家，加入湖南省战地救护队，赴上海战地救治伤员。从上海到陕北，再到徐州，直至1938年转战台儿庄，一路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

1938年，刘守玖所在的救护队，随军转战至台东十八里铺。一日，日军突袭阵地，连长中弹倒地，她冲入火线施救。突然，一名日军

军官挥刀砍向连长，没有任何防护装备的她，直接捡起路旁的一块大石头，义无反顾地砸向日本军官的头颅，日寇当场毙命。然而，一颗子弹从背后穿透她的胸膛。

重伤的刘守玖，被抬至徐州铜山县陈塘村的伤病所，弥留之际，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照片、两块银元、防身的匕首和之前写好的一封信，希望照顾她的老乡将这些东西转寄回家。那封血染的信上写着：“女儿不孝，没有告诉父母私自参军，如果死在他乡，这两块银元和在校时的一张照片就当作纪念，万望父母不要悲伤。”她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也没能向老乡说清自己的姓名和家乡，随后便永远闭上了双眼。

陈塘村的陈奶奶，含泪将刘守玖安葬，并在坟前栽下一棵小树。此后数十年，她每年清明都去祭扫，并嘱咐自己的后人继续守护英灵，继续帮无名女兵找到回家的路。临终前，陈奶奶对孙子陈开灵嘱托道：“一定替她找到家！”然而，战乱年代信笺字迹模糊，仅凭照片与匕首，寻亲如大海捞针。

直到2004年，经多方查证，这位无名女兵正是汉寿县刘村失散的少女，刘守玖的家乡

1942年深秋，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一封加急电报划破夜空：“山东根据地，急需黄金破封锁！”在上级部署下，孟英临危受命，以鲁中工商总局监察专员身份，踏上了隐秘的战线。

此时的鲁中山区，日伪据点如毒瘤般布满在群山之间。孟英带着测绘工具翻山越岭，将散落在敌占区缝隙中的零星金脉标注成册。他创新实施“以粮换金”政策，政府用粮食从百姓手中换取沙金。遇敌扫荡时，淘金户瞬间化作耕田农夫，木盆中的沙金沉入溪底，竹筛里的金屑埋进灶灰。

两年间，三千余两沙金在孟英手中汇聚成河。每一克黄金都浸透着战火淬炼的智慧。

1943年秋，孟英亲自率队押运。为了让黄金冲破封锁，他们用竹筒灌金、蜡封筒口，每根竹筒刻好编号与重量后，五十两为一组，塞进磨边子的子弹袋里。队伍刺破津浦铁路封锁线，三天急行军将黄金安全送达一一五师驻地。

据统计，抗战期间，山东军民共向延安输送13万两黄金，这一数字背后，是孟英和战士们用脚步丈量的万里征途，是百姓们用独轮车推出的秘密通道。

和名字最终得到证实确认，遗骸运回故乡，安置在湖南革命陵园，英雄终于魂归故里。而她防身的匕首，留在了热血浸染的鲁南大地，替她讲述3万将士为国捐躯的无畏与豪迈，成为中华儿女热血报国的见证。

如今，这把匕首与刘守玖的照片，共同陈列于台儿庄大战纪念馆。2019年，刘守玖铜像在台儿庄古城落成，铜像手握石块，目光坚毅。

在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伤亡3万余人，日军伤亡逾万。如今的台儿庄，“弹孔墙”上的累累弹孔，无声诉说着“无墙不毁，无土不沃血”的惨烈。刘守玖的故事，正是这血色丰碑上最柔软却最坚韧的一笔。



枣庄台儿庄大战纪念馆陈列的刘守玖的匕首。

青岛市博物馆

一张假居住证与它“不说”的主人

□ 本报记者 李媛

5月16日，青岛市博物馆二楼的第四展厅，以“五四运动”为主题展示了从青岛被侵占到解放时期的重要历史物品。其中一个展台上，摆放了一张泛黄纸张，封面上印有“青岛特别市公署发给居住证”，编号是第414007号。内页右侧清晰写着：姓名李炳玉，年龄26岁，居住地址为西达翁村180号，职业德香斋伙。

这是一张82年前办理的居住证，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3年。然而，这张居住证上的个人信息却是假的。“其实，这张居住证的主人真实姓名叫李研吾（又名李砚吾），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地下党员，李炳玉是他当时做地下工作，用来掩护身份的化名。”青岛市博物馆副研究员郑海燕告诉

记者。

自1939年开始，中共胶东区党委把青岛、烟台、威海等地作为敌占区建党的重点地区。1941年6月，胶东区党委设立了“敌占区工作科”，胶东地区大城市党的工作，也主要由区党委的“敌占区工作科”负责管理。在抗战时期，青岛的地下党组织就是这样一步步艰难地建立起来的。

李研吾，是1942年至1945年中共青岛工委的负责人，这张居住证，正是他先后三次来青岛开展地下工作时，用以掩护身份办理的证件。如此一来，李研吾得以安全进出青岛开展工作。

根据李研吾回忆录记载，在多位革命同志暴露被捕甚至牺牲后，李研吾和胶东区党委敌占区工作科科长王台总结教训，针对青岛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成立3个特支，由青岛工委直接领导，3个特支在敌占区城市开展了大量发展党员扩大力量的工作，为后续解放青岛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解放青岛迫在眉睫。上级组织委派李研吾尽快打入青岛传达上级指示，并尽可能组织力量配合解放青岛。

此时，青岛市区内形势十分严峻，国民党军队设置层层封锁沿途盘查，关键时刻，居住证帮助李研吾顺利通过了一道道岗哨，与市内地下党员取得联系，积极组织大家收集情报、保护要害部门，里应外合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

一张小小的居住证，见证了李研吾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英勇奋斗的光荣事迹，同时也见证了青岛的革命岁月。1960年，李研吾回到青岛，将这张屡次助他脱险的居民证，捐给了青岛市博物馆。

“当时，李研吾先生并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历史物品和经历故事。但我觉得，这种‘不说’正是地下工作者所一直遵循的信条和准则，也是他们最坚定的信仰。”郑海燕感慨。